

第

壹

卷

知俠文集

于友先



青島出版社

第

壹

卷

知侠文集

于友先



青岛出版社

鲁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侠文集. 第一卷/知侠著.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00

ISBN 7-5436-2358-7

I. 知... II. 知... III. ①知侠-文集②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5634 号

- 书 名 知侠文集(第一卷)
编 著 者 刘知侠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266071)
邮购电话 (0532)5814750 5814611—8662
责任编辑 徐 诚
特约编辑 万永全
装帧设计 仇宏洲
照 排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公司
印 刷 胶南市印刷厂
出版日期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32 开(850×1168 毫米)
印 张 21.5
插 页 8
字 数 536 千字
ISBN 7-5436-2358-7/I·366
定 价 (全集 5 卷)190.00 元

序

贺敬之

知侠同志是一位坚强的、卓有成就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他青年时代即赴延安投身革命，从事革命文艺事业。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同根据地解放区的人民一起，英勇奋斗，抗击侵略，参加开辟、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并进行战地采访，创作了大量反映民族解放战争生活的好作品。他曾多次深入微山湖和枣庄地区同当地游击队一起生活战斗，与山东父老同生死、共患难。多次参加战斗，并参与指挥作战，从一位采访报道英雄事迹的战地记者，走上了反映中国革命斗争史、讴歌无产阶级英雄的作家之路，先后创作了大量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儿女抗敌御侮壮举的散文、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戏剧等文学艺术作品。完成了深受人民大众喜爱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这部小说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文学史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建国后，知侠同志在山东省担任文艺领导工作的同时，仍坚持深入生活，进行创作，陆续发表了《铺草》、《沂蒙山的故事》、《红嫂》、《“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等优秀作品，深受广大读者和文

学界的好评。特别是他的代表作《铁道游击队》蜚声中外,发行量达四百多万册,还被译成英、俄、法、德、日、朝等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优秀作品。

在十年动乱期间,知侠同志受到迫害,被打成“山东文艺黑线头子”,致使他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但他仍一如既往,不改初衷,继续在农村,在渔岛,与那里的人民同甘共苦。白天劳动,夜晚写作。在严峻的环境中得到的革命和人生的新体验及积累的大量新的生活素材,为他当时和以后的创作开拓新境界提供了条件。

粉碎“四人帮”后,知侠同志意气风发,笔耕不辍,不断有新作出现。他的晚年,是在饱满的创作激情中度过的。自1982年起,他多次向省委打报告,要求退出领导岗位,致力于长篇小说《沂蒙飞虎》、《决战》和《淮海战役见闻录》的创作。在生命的最后五年里用自己博大的胸襟,炽热的情感,不倦的笔墨,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又留下了一百万字的优秀作品。这是特别令人感佩的,人民不会忘记他,读者不会忘记他。

知侠同志的作品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他的作品已经被历史和文学史所铭记,我本人很早就是他的忠实读者,他的作品透着凛然正气。

今天,《知侠文集》即将付梓,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知侠的夫人刘真骅同志,当年既是他的忠实读者,又是他患难时的知己。当知侠同志突然离开我们以后,在将近八年的时间里,她默默地、一件一件地完成了知侠同志未竟之业。为了全面反映知侠的革命生涯和创作历程,她东奔西走,查找历史资料,翻阅文献档案,一字一字地将二百五十万字的《知侠文集》编辑成册,完成了知侠同志生前的未了心愿。作为文学知音,作为生活伴侣,这部《知侠文集》里也浸透着真骅同志的心血。相信读者在阅读这部文集时,也会因此而深为感动的。

1998年12月14日写于北京

自序

知 侠

我从青年时期就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多年来我写过一些军事文学作品，应该说我走过的是一条战火弥漫的文学创作道路。

1938年，我作为一个喜好文学的青年，抱着满腔抗日热情到陕北延安去参加革命，在抗大学习，当时被编在洛川的六大队。抗大是抗日军政大学的简称。主要的课程是学军事和政治。当时设在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也在招生，那里有文学专业课，我就要求组织上，把我转到鲁艺去学习。由于鲁艺的学员名额已满，领导上没有答应我的请求，劝我说：“现在敌后方正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游击战争，需要军政干部，你还是留在抗大学习吧！”这年冬天，为了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到敌人后方去”的号召，我们六大队和其他几个大队，组成抗大一分校，东迁敌后办学。第一次东迁，行军一千多华里到达晋东南的太行山的潞安地区。我虽然没去鲁艺学习，但是我当时还是挺喜欢文学的。我当了我们学习队的墙报委员，平时再紧张的行军，也没耽误我写日记和文学札记。记得过绵山、过川口

时我还即兴地写了两首小诗,不过都在以后的艰苦战斗岁月丢失了。

在太行山学习时,校部出一油印刊物《抗大文艺》,我在上边发表一篇散文《晚风里的一群》,是描写我们学员在课余种菜劳动的,这算是我参加革命后的处女作了。记得当时没有稿酬,只给作者一本毛泽东著的《论持久战》。这对我来说已感到很丰厚了。

1939年5月,我在抗大毕业,同学们都分配到主力部队或地方游击部队去工作了。也许是因为我的军事课程的成绩好,身体也较健壮,所以又把我留校在军事队继续学习,为的是把我培养成一个留校从事军事教学的干部。毕业后,在抗大分校当区队长、队长或军事教员。我原打算学习文艺的,鲁艺没有去成,留在抗大学军事和政治,现在毕业了,又要留校专门攻军事,将来肯定是一个军事干部了。当时我感到自己离开文学愈来愈远了。由于我已是党员,当然得服从组织分配,所以我就打消了从事文学创作的愿望,便投身到军事队的严格的军事训练中去了。抗大是个军事学校,学员都穿军衣,发武器;像部队一样按连、营、团编制。平时进行军政教学,一遇到敌人对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时,他们也作为战斗部队使用,配合主力和敌人战斗,使学员们在战争中学习打仗。他们平日学的军事知识,可以在战斗中的应用;而实战经验又可以丰富和充实他们所学的课程。由于我们是学军事专业的,我们队的武装装备比一般学员队要好一些。为了军事教学,给我们配备了三挺轻机枪:一挺捷克式、一挺苏式转盘机枪和一挺日式的歪把机枪。我们队的军事训练要求是很严格的。从一二一的正步走,到班教练、排教练、连教练,从军事动作到战斗行动,如板上钉钉一样一丝不苟。我们往往是上午学军事课目,下午到野外进行军事演习,我们学进攻、学防御、学迂回、学突袭。每天东跑西颠,一天不知要出几身汗。记得那年冬天,我们天不亮就集合起来跑步,太行山山高地陡,山村多在山坡上,村子里很难找到一块平地当操场,我们的队长倒很有

办法，他指着村边一个近千米的山头对全队学员下达命令：全副武装，到山顶集合。他带头走在前边，我们学员扛着背包和枪支弹药，谁也不甘落后地沿着山坡向上攀登。经过半个小时的爬山，每个学员到达山顶时，累得浑身是汗，棉衣已被汗水湿透了。这比在操场上跑二十圈还吃力。

这年年底，我们军事队的课程学完，将要毕业了。我们经过半年多的严格军事训练，都熟练地掌握了军事技术，不仅身体健壮，而且战斗士气高昂，简直像一群下山的猛虎。就在这时候，抗大一分校又接到上级的命令，作第二次东迁，出东阳关，下了太行山，横越河北平原，穿过被敌人重兵封锁的平汉、津浦铁路，直插山东的沂蒙山区。在这到处是敌人的一千多里的长途行军中，随时都可能遭到敌人的袭击。我们的军事队和校部的工人队是装备较好、战斗力很强的连队，在行军中，不是前卫就是断后，哪里敌情紧张，就把我们军事队派过去。在过平汉铁路时，一夜行军一百三十里，当走近铁路检查部队时，少了一个大队，校长就命令我们军事队，又插回去十多里去找上这个大队，再折回来，和其他连队一道过铁路，这一夜大伙行军一百三十里，而我们军事队行程却有一百六十里，由于我们过去在太行山山地进行军事训练，两条腿锻炼出来了，一奔上河北平原，真是健步如飞，一夜一百六十里行程还没感到怎么疲劳。

我们到达山东沂蒙山地区后，学校对二次东迁进行总结，由于在战斗行军中的突出表现，我们军事队被评为全校的先进单位。这时我也俨然成了一个军人，无论从仪表、服装以及一切行动上都符合军事要求。这次东迁和第一次东迁不同的是，在第一次东迁的行军路上，我经过一些地方，常常为奇特的景物所吸引，引起我文艺上的构思，晚上把它写在文学札记上；这次行军路上，如过一险峻的山口，我不是从文学、而是从军事上考虑：如对面来了敌人怎么应付，应该首先抢占山口旁的小山头，只有占领了这个制高点，才

能居高临下,用火力掩护自己的部队通过,要是叫敌人抢先占了山头,我们通过山口就要付出重大伤亡。在第一次东迁行军住下来以后,我就和炊事员坐在一起,借着行军灶下的火光,来匆匆地写文学札记;而在这次东迁行军住下来以后,第一件事由队长带着各班排长,到住村周围去察看地形,一方面确定夜间岗哨的位置,同时遇到敌人袭击时,利用有利地形,沿着哪条道路往外冲,并事先指定了村外的集合地点。就是各班住在老百姓家里,在就寝前,也要看看大门两侧、屋前屋后的地形,遇到敌情,才不致措手不及,能够沿着较隐蔽的地形,安全地冲出去。我们已到达沂蒙山根据地,第二次东迁长途行军的任务已经完成。可是每到一地察看地形,研究遇有敌情如何应付,这种习惯,好多年以后,我还一直保持着。

从抗大到达山东已是1940年初了,记得我们是在沂蒙山根据地过的春节。学校开始招收学员,我们军事队的同学都分配到各个连队从事军事教学工作了。这时我已热爱军事工作,很愿意分配到连队,一方面作教学工作,同时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领导学员去和日寇作战。因为抗大虽是学校,但在敌人对根据地进行“清剿”“扫荡”时,抗大的各个连队都要担负战斗任务,使学员在对敌作战中来充实自己的军事学习,也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可是当组织上分配我的工作时,却使我感到意外,领导并没分我到连队去搞军事教学,而分配我到抗大文工团去工作了。因为他们知道我在《抗大文艺》上发表过作品,又在军事队当过救亡室(以后改为俱乐部)主任,搞墙报,画伟人像,还会写美术字,认为我是个文艺人才,加上文工团需要补充干部,所以组织上就分配我到文工团去。当时我思想上还有些不通。如果在两年前我刚到陕北时,要我到鲁艺去学习我是高兴的,可是我在抗大不仅学完了全部的军政课程,而且又留校专门学习军事,我已热爱军事工作,现在要我转回头来从事文艺工作,我倒有点不乐意了。当时我向组织上表示:我到部队或到连队去作军教工作,比作文艺工作发挥的作用要

大些；我是学军事的，现在要我去文工团，所学非所用，怕完不成任务。这时和组织科一道和我谈话的文工团副团长对我说：“听说你会写文章，又懂得艺术，我们欢迎你到文工团工作，至于说到你是学军事的，这对我们来说就更需要了。因为我们都是文艺工作者，不会打仗，在敌后活动，经常会遇到敌人的袭击和‘扫荡’，到时候你就可以领导我们去对付敌人。我们文工团很需要像你这样既懂文艺、又熟悉军事的工作人员。”虽然这位文工团的负责人，并没完全说服我，但是党组织既然已经决定，我只有服从。就这样我被分配到文工团工作了。

由于我在军事队过惯了严格的军事生活，乍到文工团我有点不习惯，因为我从仪表、军风纪以及举止行动，都是符合战时的军人要求的；可是文工团员的生活却是自由散漫的，经常是衣帽不整，行动起来也是拖拖拉拉。比如在军事队集合的哨子一响，不到五分钟，全副武装的学员就集合起来，而且队形整齐。而在文工团里虽然连续吹着集合的哨子，可是一刻钟也集合不起来，就是集合起来了，也丢三忘四，队形混乱。为了使团员们的行动更符合战时要求，我费了不少力气，可是收效甚微。每当校部集合直属队开大会时，其他单位的同志看到我站在文工团队前，军容整洁，态度庄严，斜挎着匣子枪，都悄悄地问团员：你们那里怎么调了个军事干部啊？！这说明我当时和文工团员之间是如何不协调了。

我在文工团工作，平时除帮助团长整理队伍，战时负责军事指挥而外，也作一部分党的工作（后期曾任过党支部书记），但是我既然是文艺团体的成员，我就应该参加一些业务活动。文艺工作团是以戏剧为主，也是结合音乐、美术、文学的综合艺术团体。我虽然不会演戏，但是在演出人员短缺的情况下，有时我也化妆成群众，在戏里跑跑龙套，有时我也杂在合唱团的行列里唱唱歌。但我大部分时间是参加创作股的文学业务活动。因为我们深入敌后，开展抗日宣传，是没有文艺演唱材料的来源的，一切都得由文工团自己创

造。比如给部队和根据地人民群众组织一个文艺演出晚会,我们创作股的同志就要到火热的战斗生活中去采访材料,回来后就连夜突击写作:写歌词的、谱曲子的、写剧本的、画连环画的,大家同心合力,自编自导自演和自唱,创作出一台文艺晚会的演出节目。又有新任务下来了,我们又出去收集素材,进行创作,组织新的演出。我就是这样常常到艰苦的斗争生活中去采访。我到敌占区去了解发动群众的抗日活动,到火线上去了解我军战士和日本鬼子战斗的英勇事迹,我也到轰轰烈烈的群众翻身斗争中去,去了解根据地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如何站起来配合人民子弟兵战胜日寇。每当我带回大批材料来,除了供给文艺节目的创作外,我也利用了自己所喜爱的文学形式,写成文艺通讯、报告文学在根据地的报刊上发表,沂蒙山根据地成立的第一个妇女识字班,就是我在《大众日报》上报道的。

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我在山东解放区的报纸和刊物上发表了很多文学作品,从这些敌后的文学活动来看,1938年我初到陕北时,没能去鲁艺学习,不仅不是坏事,相反的倒有点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因为丰富的斗争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如果当时我去了鲁艺,留在延安后方学习,我就不可能写出反映敌人后方抗日游击战争的作品。我们开始进入敌人后方,斗争是极艰苦的。因为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刚发动,抗日根据地从无到有,正在开辟,我们的部队和地方武装还处在幼小的阶段,而敌人的力量还占绝对的优势,不仅有日本侵略者和汉奸队,还有国民党残留下来的顽军以及当地的封建地主武装。由于他们在反共上是一致的,所以联合起来对付我们刚刚发动的抗日人民武装。因此,我们在敌后的活动就特别困难,随时要和各种各样的敌人进行战斗。我们经常是吃不上,住不下,冲破敌人的围攻,和敌人转山头,打游击。在这种艰苦战斗的形势下,我在军事队学习的军事知识,对我的帮助太大了。和一般同志相比,由于我懂得军事,在战争环境里,我就有了

较大的活动自由。它不仅有利于我在火线上采访,同时在我们集体活动时,遇到敌情,我可以对付,必要时能够组织力量和敌人进行战斗,向包围圈外突击。

1941年冬,敌人集中五万兵力,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铁壁合围”“拉网战术”的大“扫荡”。敌人对方圆百里的山区重重包围,控制了所有的村庄、山头 and 道路。然后敌人分区进行“清剿”。我们抗大文工团已被包围在沂蒙山的中心地带。我们分两个队活动。我带着一个十多人的分队,为敌人所包围,向外突围,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到达另一地区。第二天这里四周的敌人又向我们进行“围剿”,我们又向外突围,冲到一个地方,还没站稳,再次遭到埋伏在四处敌人的围攻。就这样,我们向外冲了七天,都没冲出敌人的包围圈。虽然我们小有伤亡,一个团员牺牲,一个团员被俘,但是我们这个分队绝大部分还是胜利地冲出来了。

敌人大“扫荡”将结束时,我们遇到了第二次突围,这次突围虽然没和敌人交火,但它的危险性要比第一次突围大得多。当时校部组织由文工团在内的近三百多非战斗人员,从沂蒙转移到东南的滨海地区休整,可是要在一夜之间穿过八十里为敌人重点控制的丘陵和平原地带。由于这一地带地形平坦,敌人众多,而且火力很强,如被敌人发现,将我们包围,没有好地形可利用,我们就很难突击出去。所以采取了夜间行动,悄悄地从敌人驻地的空隙里急行军穿过这一地区。为了防止万一,校部又派了五个连队来掩护我们三百多人员通过。就是前边三个连队作掩护,后边两个连队作后卫,把我们夹在中间行军。由于这次行军危险性很大,三百多被掩护的人员都作了紧急的动员:一定要在天亮前穿过这一地区,每个同志都紧跟着,不要拉档子,更不要失却联络。特别说明:谁失掉联络,就等于送给敌人,绝不去寻找,因为一掉队,就去寻找,这就耽误了行军的时间,天亮以后,出不了敌占区,为敌人发现,被敌人包围,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纵然有五个连队掩护,而这些连队都是学员

队,武器装备很差,战斗力也不强,加上经过一个多月的大“扫荡”,既付出了不同程度的伤亡,又十分疲惫。遇到敌情,是很难保证被掩护的三百多人的安全的。我们就是怀着这种紧张的心情开始夜行军的。当我们走到午夜,估计已行军四五十里路,到达一个丘陵地带。由于夜里起雾,我们和前边担负掩护任务的三个连队失掉了联络。我们文工团正走在被掩护的人员的前边。我们的团长和一个通讯员也随前边连队走了。我赶快传话到后边,要后边作后卫的那两个连队,派一个连队到前边来作掩护,继续前进。可是后边的人员传话上来说,他们也和担任后卫的两个连队失掉联络。也就是说我们被掩护的三百多人和担任掩护任务的五个连队,整个地失去联络了。这时,校后勤部的协理员从后边上来,我和他又派人到行军行列的前前后后去联系,找了一阵,还是找不到掩护部队。协理员问我怎么办,我说:“咱们再不能找了。再找下去,既找不到部队,又耽误了时间。天亮以前出不了敌占区,我们没有部队掩护,如敌人发现,三百多人会全部覆灭。”我的意见是争取时间加快脚步向南冲出去,协理员同意我的意见,应马上摆脱我们目前的危险处境。因为80里夜行军,我们只走了一半路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立脚点,正是整个敌占区的中心地带,是敌人重兵屯聚的地方,我们应该一分钟也不能耽误地离开这里。可是这三百多人是由各部门组成的,而下一步行动,需要统一指挥,我认为协理员是营级待遇,级别比我高,而且被掩护的人员,大部分是他的部下,应由他指挥我们向南突围。可是协理员说他不懂军事,要我负责指挥。由于情况十分危急,我也就不谦让了。我就把三百多人中有枪的人挑选出来,手榴弹也都集中,临时组成两个战斗班,一个班由我率领,在前边冲,协理员带一个班作为后卫。我们这三百多人就在夜色里向南急奔。由于大家都认识到严重的敌情,感受到失去掩护的危险处境,所以大家都自觉加快了脚步。我们不仅仅是急行军,而是小跑着向南突进。我们不走村庄,都是在敌人驻地之间急行穿过。在行

进过程中，我带着通讯员亲自去找向导，一次误入了敌人的伙房，一次误入了伪乡公所，但幸好没为敌人发现。在天亮前我在一个村边找到了一个早起拾粪的中年人，由他带路，使我们绕过一个个敌据点，冲向南去。天已大亮了，还有十多里路，才能出敌占区，幸亏早上有雾，使敌人不易发现我们，我们穿过被敌人逼着去修据点的人流，越过了最后一道公路，到早上九点多钟，我们才突出敌占区，到了滨海地区的大店，这里已是安全地带。我们又向东南行军十多里，到达了这次夜行军的宿营地。我们住下以后，却找不到掩护我们的五个连队。当时我想他们是先头部队，怎么比我们还晚到？后来才了解到昨夜他们和我们失掉联络后，他们不敢前进了，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掩护部队，他们的战斗任务是保卫我们行军的安全，如果被掩护的三百多人，失去联系，遭到敌人的包围，由于没有战斗力，是会全部牺牲或被俘的，如有这样的后果，他们怎么向上级交代？在此情况下，他们派连队在敌占区寻找我们，找不到我们，他们是不会轻易离开敌占区的。而我们竟直接向南插去，冲出敌占区，他们怎么能找到我们呢？我们在宿营地吃过午饭，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听见西北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随后炮火停了一阵，黄昏以后，那边又响起了剧烈的炮火声。原来他们找到天亮也没找到我们，上午还有浓雾掩护，敌人没有发现他们，到了下午浓雾消散，敌人在一个村子发现了他们，对他们进行围攻，他们和敌人展开了战斗，终于冲出敌人的包围。他们到达另一个小岭，天已黄昏，又被敌人包围，又和敌人展开了战斗，经过一场血战，再次冲杀出来，这时周围的敌人已发觉了他们，到处出兵堵击，他们已站不住脚，就乘着夜色冲杀出敌占区了。他们到达宿营地以后，才发现我们于昨夜不鸣一枪地从敌占区冲出来，也感到很高兴。因为他们虽然和被掩护的人员失却联系，却没有造成损失，他们也比较安心了。

我曾把这两次突围写进中篇小说《沂蒙山的故事》中。另外在解放战争期间，我在省文协作党务工作，也曾遇到了军事斗争的艰

险情况。敌人重点进攻时,我们转移到胶东。后来敌人又集中了5个整编师向胶东进行重点进攻,敌人以优势的兵力,从半岛西部向东部齐头推进,他们扬言要把我守卫胶东的部队赶进东海,当敌人攻到莱阳时,我主力突然向外线出击,插到敌后,而我们文协的一批文艺工作者,却处在敌进攻的前边,失去了主力的支援和依托,敌进我退,形势十分危急,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由文变武,我把编辑部、文工团和全部有枪的青年组织几个战斗班,成立一支武工队,掩护文协的老弱转移,和进攻的敌人周旋,一直坚持到我军反攻,敌人溃退,形势好转。

我所以要谈这些充满危机的战例,是想说明深入敌后,我受过的军事教育,在我身上起到的作用。由于我懂得军事,遇到严重的敌情,我就可以从容地应付敌人,使情况转危为安。应该说我们深入敌人后方以后,战争是抗日军民生活的主旋律,不但主力和地方武装要经常和敌人打仗,就是根据地的党政和群众工作的干部以及所有工作人员,都要受到战斗的洗礼。平时,敌人对我抗日根据地是经常进行袭击的,每年至少要应付敌人的春、冬两次大“扫荡”。因为这两个季节是农作物已经收割、或者还未生长起来,在光秃的田野,不便于我军民隐蔽;却扩展了敌人的视野,给敌人强大的炮火增添了杀伤力。每当敌人“扫荡”的时候,一方面寻找我军主力作战,同时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清剿”,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就是烧光、杀光和抢光)政策,“围剿”我党政机关,摧毁我地方政权及抗日群众团体。在这严峻的时刻,我们的战斗部队为了保卫党政机关的安全,和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而作地方工作的干部一方面动员人民群众坚壁空野,隐蔽自己,同时也秘密而巧妙地进行对敌斗争。稍一不慎,就会遭到重大伤亡。我们文工团,本来是没有战斗任务的,可是一到敌人“扫荡”,我们却会遇到危急的战斗情况,这时候我过去所学的军事知识就显得特别宝贵了。

我熟悉军事,对于我的文学创作活动,也有着极大的帮助,我

们的部队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经常和敌人进行英勇战斗，为了反映这方面的军事斗争，我常到部队去采访，有时我可以直接深入火线，去体验和了解指战员所创造的英雄事迹。一般记者也作战地采访，可是却缺少我这一条件。战斗开始前，指挥员往往把他们安排在离火线较远的后方，待在较隐蔽的地方，免得为敌人的炮火杀伤。记者是应该服从部队的安排的。因为上级有明文规定：凡是到部队采访的记者，一律服从部队的指挥，不要增加人家的负担。如擅自行动，遭到敌人炮火的伤亡，部队不好向上级交待，还得作检讨。可是我的情况却不同了，一则我到火线上，可以应付敌情，同时部队的指挥员多是我抗大军事队的同学，他们也不好批评我，因此，我在火线上可得到比待在后方的记者更多的战斗生活感受。

我不仅了解部队的战斗生活，我也去了解和熟悉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因为人民是革命部队的母亲，军民是鱼和水的关系，在那艰苦战斗的年月，没有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的革命部队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因此，我们根据地是在军爱民、民拥军的亲密关系中建立的。不了解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也是很难写好我们革命部队的军事战斗生活的。

使我难忘的是，1942年文工团调到地方上，我们在临沭县参加了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的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的试点工作。时间虽然将近一年，但对我的教育和在文学上的收获实在太大了。我深入到雇工、贫下中农中去，和穷困的劳动农民心连心，在生活上和他们打成一片，发动、组织群众，成立职工会、农教会、妇教会、青教会和儿童团，向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实行“双减”，改造为地主把持的旧政权，继而建立民兵和游击小组，保卫胜利的斗争果实，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最后秘密地成立了村的党支部。我参加了这一系列的群众斗争，在这期间我写了《三千人的控诉》、《钱包身》和《遥寄给沭河边的民兵英雄们》，在《大众日报》上发表。通过这一段群众工作，增强了我的群众观念，我深刻地认识到，劳动农民在党的领

导下,经过翻身斗争作了主人。一旦他们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抓住印把子,拿起了武器,将会产生不可战胜的巨大力量。他们支援和配合革命部队,去战胜敌人。随着“双减”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全面展开,根据地的人民的觉悟提高了,抗日群众团体更巩固了,民兵武装更壮大了,各个抗日根据地不仅日趋巩固,而且逐渐扩大了。

1943年敌后的抗日形势大大好转,随着根据地的扩大,敌占区日渐缩小,我各个根据地之间距离缩短,有些地区几乎连成一片。为了开展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工作,成立了山东省文协。抗大文工团也调到省文协充实这一文化机构。我到文协后,主编《山东文化》刊物,编辑部配备的人员还比较干练,我就更有条件采访和写作。在文协工作期间,我写了很多作品,这是我在抗日战争中创作最旺盛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我写了短篇《机枪射手老刁》、《翻译官怎样挨了洋刀》和《乡分队长唐家高》。我军攻打赣榆县城时,我随战斗部队采访,写了《攻克赣榆之夜》。为了配合根据地的冬学运动,我写了《韩邦礼苦学记》,这篇1万多字的报告文学在《山东文化》上发表,算是当时最长的作品了。这时已有稿费,每千字一斤猪肉钱。我用这批稿费买了10多斤猪肉请文协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吃了一顿。

1943年夏天在滨海根据地的坪上召开的山东省战斗英模大会上,我采访了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我为他们传奇式的英雄事迹所感动。我决心把他们的战斗业绩写成一本书。为此,我于1944年越过临沂、枣庄和津浦铁路几道敌人封锁线,到达微山湖和铁道游击队的指战员生活了一个时期。我和他们一见面,就热爱着这些英雄人物了。他们热情、豪爽、勇敢。我和他们的大队干部和主要的短枪队员,畅谈多年来他们在铁道线上创造的神勇的歼敌事迹。从枣庄开炭厂的草创时期,到从临枣线打到津浦干线的军事斗争,后来又以微山岛为依托,对津浦干线的敌人进行神出鬼没的袭击。他们打票车、夺枪械、撞火车、搞物资,并消灭了一个个经过敌人精